

<<温故之十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温故之十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63370986

10位ISBN编号：7563370986

出版时间：2008-1

出版时间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作者：刘瑞琳

页数：157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温故之十>>

书籍目录

特稿 《纽约时报》驻华记者的回忆人物 毛彦文其人其事 宁折不弯一老人——追忆钱孙卿先生
郑孝胥与严复交往始末口述 叩门访师记 从小学到大学回眸 温雅中有“铁”——从集外遗文看
周作人骂陈西滢记忆 1937：寄寓北平故事 空战英雄刘粹刚的生死恋聚焦 “三十年代”问题——
从《顾准自述》看“两个口号”的论争片语 胡适与北大旁听生——兼及胡适为人的一宗疑案文本
一份延安时期的“特嫌”档案 顾颉刚致刘敦愿书信四封影像 西洋版画与北京城来函选登 杨向群
来函 王岩来函 王任来函

<<温故之十>>

章节摘录

《纽约时报》驻华记者的回忆 哈雷特·阿班1926年来中国，从事新闻采访与报纸编辑，1929年起任《纽约时报》驻北平特派记者，后调往上海，任中国首席记者，凡十二年，于1941年离任回国。

1944年出版《民国采访战》一书，回忆了自己在在中国历时十五年的记者生涯。

该书的中译本即将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。

这里刊出的是该书的节选，文中的标题为编者所加。

——编者 接掌《英文导报》8月（1926年——译者）底，我终于迎来了转机。

我收到北京《英文导报》东主葛洛甫·克拉克的信，问我是否有兴趣去北京，替他担任报纸的总编。

他提出的薪水是每月六百大洋。

我到处打听北京《英文导报》的情况，大家却避而不谈，甚为奇怪。

有人说，报纸“还可以”——但又说，克拉克曾经是个教授，不是个专业的新闻人。

他这家公司的大部分股东应该都是传教组织，有些还是中国人。

克拉克本人常被称为“空头激进派”。

我们之间有了书信往返后，克拉克先生写道，他要找的人，要在北京《英文导报》“至少呆到1927年中”。

我最后回信谨慎地说，我会在9月中旬自费北上，先开始工作。

六周之内，给他个明确说法，看能不能呆到1927年中。

我指出，这么做的话，即使我决定不在北京呆那么久，他也有足够时间在年底前另觅人替代。

大家白纸黑字同意这些条件后，我终于在四十二岁生日那天，乘船从上海赴天津。

几个月后，我离开的地方成了全球的新闻中心，也成了紧张态势的发源地。

但是，我跑到北京来，看似避重就轻，却在后来几年，多方证明我的这一选择有无上价值。

我与北京《英文导报》的关系，一直持续到了1927年6月。

在我的整个新闻从业史上，这段工作是最不寻常的。

期间，我对远东政治生活的认知，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震动。

我至今仍在庆幸，与该报分手，居然没闹到严重损害我的职业声誉和人品的地步，实在难得。

该报的主持人葛洛甫。

克拉克是个友善的人。

他体格肥壮，一只眼略有斜视，态度有时客气得过了头。

但不知怎的，他总让人觉得不自在，好像别人欠了他什么。

我抵达那天，他请我去他家共进晚餐，我也有幸认识了克拉克太太和两个孩子。

席间，克拉克侃侃而谈，讲到外国人在北京要找到理想住所殊属不易，接着，便提出要把他的房子分出一部分租给我。

给我的部分包括客厅、餐厅、浴室、储藏室和一间大卧室，自带一进院子，与克拉克的那部分住所是隔开的。

他还提议，可以让他的几个仆人专门过来替我做饭和料理其他家务。

他要求的租金相当便宜，我就当场答应了下来。

我说，我现在只答应先住六个星期，然后才决定是否替报社干下去。

克拉克的寓所在城墙内，位于京城的最东边，胡同的名字大概是“翰林”的意思。

北京《英文导报》的印刷厂则靠近市中心，在煤渣胡同的一个小小四合院里，房间和院子都用青石板铺地。

排版是靠中国排字工手工完成的，而除了工头外，工人们对于英文都是一字不识，令我称奇。

报纸的发行量只有一千两百份。

印厂的工资开销可以靠接外活来负担。

报纸的内页主要是重印美国报纸的内容，而这些美国报纸运到中国时，已经晚了一个月。

头版一般是合众社的电讯，要不就是其他带有半宣传性质的通讯社的免费电讯。

这些通讯社往往是由中国或日本或俄国的各种组织资助的。

<<温故之十>>

我查看了档案，发现除了从美国出版物上剪来的内容，几乎没有社论。

本地新闻也极少，因为报纸没有自己的记者。

见这种经营方式实在有违常规，我便萌生了退意，决定六个星期一到，就知会克拉克，不准备住满半年，但可以助他一臂之力，直到他找到我的继任人。

后来，我又发现，克拉克的薪水是每月一千大洋，但欠薪已有半年了。

这一发现，更坚定了我离去的决心。

我履新三个星期后，一个星期六的上午，《英文导报》的广告经理斯坦立·弗雷耳一头冲进我的办公室，样子极度的惊惶。

弗雷耳后来成了我的好朋友。

“克拉克下星期三要回美国了，你知道吗？”

“我愣住了。”

“那谁来坐我的位置？”

“我问。”

“你不知道这事？”

“一点儿风声都没听到。”

你是怎么知道的？”

“出去拉广告时发现的，”弗雷耳道，“我在美国运通公司发现他给自己、太太还有两个孩子买了去芝加哥的船票。”

在一家裁缝店，我又发现他下了紧急订单，要做五套西装和一件大衣。

在我们报纸登广告的鞋匠也说，克拉克在他那儿定做了六双新鞋，最晚必须在星期二交货。

从公司账簿上可以查到，克拉克已经把欠他的薪水全领了。

“报社大概突然发了笔什么横财，但这已经与我无关了。”

我思忖，克拉克既然对我封锁消息，显然是瞒着我另请了高明，趁自己不在北京期间，来接替我的位置。

由于星期一不出报，谈话后的翌日，即星期天，我便在客厅里与人打桥牌作乐。

打到一半时，突见克拉克随随便便地走了进来，大声对我说，有要事与我商讨，让我请客人离开。

我的朋友们听了，都很识相，各自告辞走了。

我则做好了准备，等着平生第一次被人炒鱿鱼，只是在好奇，不知克拉克会找个什么借口。

他开门见山道：“告诉你件意外的事，星期三我要回美国去了。”

“我没好气地回道：“一点都不意外，早就听说了，知道你买了船票、西装，还做了新鞋。”

“怎么会……”他刚要接口，我举手阻止了他。

“我哪里听来的还有什么相干？”

我想知道，你打算让谁来替你经营报纸？”

“怎么啦，当然是你了。”

“不是我，”我强调。

“你全都搞错了。”

“接下那半小时，我回想起来便打寒颤，因为我被他弄得极不舒服，心里满是厌恶。”

克拉克先是说，他对我们白纸黑字写下的协议“没有搞懂”，继而又大声抽泣开了，说他太太病得很严重，必须即刻就启程。

见我打破砂锅问到底，他才说，他太太快要瞎了，得立即开刀，才能保住她的视力。

而唯一能做这项手术的医生在芝加哥。

最后，经不起他的软缠硬磨，我只得违背自己的心愿，同意呆到1927年春。

作为交换，克拉克同意付我每月一千元，但如果需要另外雇人协助我采访的话，工资必须从这一千元里出。

他自己房子的租金还由他负责，我则支付他的所有仆人的开销，伙食也自理。

出乎意料的是，他轻易就同意以北京《英文导报》公司总裁的名义给我一封信，授权我在他缺席期间，全权制定报纸的新闻及社论方针。

<<温故之十>>

由于我跟报社的诸多董事都碰过面，知道无法与他们在公司方针上达成共识，便坚持克拉克在信中另加一段说，在他缺席期间，若有任何董事干涉我的管理，我便不必等到他归来，只需提前二十四小时通知，就可辞职。

星期一，正式协议便送达我的手里，看上去一切正常。

但后面发生的事，给了我一个教训，知道从此以后，对于一切协议和法律文件，都要一再推敲，大意不得。

克拉克一家定于星期三下午乘1点半的火车前往天津。

12点半时，克拉克急匆匆地跑进我的办公室道别，祝我一切好运，又为自己匆忙离去道歉，说太太和孩子们已经等在外面的出租车上了。

五分钟后，一个中国职员送来一封克拉克的信，上面直截了当地指出，他与我的书面协议授予我的权利“只包含新闻部分”，并通知我说，所有社论一概须由董事之一的德怀特·爱德华兹撰写。

爱德华兹的正职是北京基督教青年会的书记。

阅毕，我一下变得怒不可遏，冲出门去，跑过院子，闯进了克拉克的私人办公室。

他正费力地往身上套那件新大衣。

我对他说，我一收拾完东西，马上就走。

他一听，再次向我求起了情，而且哭开了。

于是我一错再错，又傻乎乎地作了让步，同意留下。

但是，我在让步前，与他重签了份协议，双方在证人面前签了字。

协议说，我对报纸的新闻方针与内容有绝对控制权，我不得受到干涉；并规定，德怀特·爱德华兹必须与我就社论的方针及措辞取得一致，否则任何社论不得见报。

初识顾维钧由于采取了这种联合检查制度，在克拉克缺席的近八个月里，报纸只发表了三篇社论。

这段时间里，中国要事频仍，件件都对美国的对华政策具重大意义。

但爱德华兹禁绝了我的声音，我也如法炮制，禁止他在报上出声，因为我无法同意他的观点。

1926年秋是北京，是个奇怪的政治真空。

各国的公使馆和大使馆运行如旧，而北京的政权，却已实在谈不上是整个中国的政府了。

各国外交官上任时，备案的地方虽然都是在所谓的外交部里，却都坦承，“北京政府”的实际权力出不了古都城墙外三十英里。

外交部的功能，只是用来存放各国给中国的文件，而这些文件，也只是例行的法律及外交公文而已。

1926年初，北京周边战事连连，最终导致所谓“基督将军”冯玉祥败走西北方向的张家口。

冯玉祥是被吴佩孚和张作霖联手打败的。

吴佩孚原先的地盘在汉口，我9月抵京时，吴正好惨败于蒋介石的国民革命军，汉口也被北伐军攻克。

张作霖则是满洲不容争议的头号军阀。

按理说，各国政府承认的所谓中国政府，以及北京市，是由吴、张两个军阀联手控制的。

但随着吴佩孚在汉口一带挫败，张作霖便有了可乘之机，可以独自问鼎。

果不其然，不久后，他便公然付诸行动了。

而遭到败绩的吴佩孚，则向西退入了四川省。

北京的外交圈和社交圈则继续在北京饭店的屋顶宴饮作乐，歌舞升平。

年初，这些身份显赫的外国狂欢者刚在此听过鏖战时的隆隆炮声。

对于中国的内斗，他们还是一如既往的漠不关心。

顾维钧博士是那时的外交部部长，也是徒具虚名的执政内阁中的一员。

克拉克离去后一个月，一天早上，我突然接到他的电话，让我立即去外交部。

那是幢美轮美奂的大楼，有围墙环绕，广场敞阔。

我到时，见怒气冲冲的部长已经在等我。

“你发表这么篇东西是什么意思？”

他尖声问，把早晨出版的《英文导报》塞到我鼻子下，指着其中的一篇文章，一边用力抖动着报纸

<<温故之十>>

那是一篇关于中国拖欠一笔外国贷款的报道。

“你是什么意思，竟想对我怎么处理新闻指手画脚？”

我反问，怒火绝不稍逊于他。

顾博士继续尖声道：“克拉克答应过我不报道这件事的。

我花了一万五千美元，从他那儿买了一堆一钱不值的股票，他拿这钱给自己发了拖欠的薪水，还回夫国去，现在却又出了这种事。

我终于不费吹灰之力，就发现了那笔意外横财是怎么来的。

于是，我告诉顾，我的合同授予我处理《英文导报》新闻方针的绝对权力，向且有权否决我不喜欢的社论。

他听了，才稍微平静，随即又将怒气转向了不在场的克拉克。

但我们交谈良久后，反而变得友好了。

部长也和蔼可亲起来。

他在当时及以后，向我透露了中国内政外交的诸多宝贵情况。

我在《英文导报》任职的余下时间里，顾博士再未请求我对某件新闻作特殊处理，或命令我将某件新闻压不不发，不管所涉事件对那摇摇欲坠的政权有多大损害。

要知道，他可是那个与司徒雷登们的分歧是年冬天，北京平静无事。

但在长江流域，国民革命军捷报频传。

由于那时的国民党人强烈亲共，鼓动排外，对外国人，尤其是教会及传教士屡施暴行，终于刺痛了美国、英国和其他缔约国。

各国开始仓促部署保护行动。

开进上海英租界和法租界的外国军队已超过了两万人，路上还有后续部队源源不断涌来。

隆冬时，国民党人攻克了南京，一些不法分子趁机在城里大肆劫掠，导致外国人被杀，外国妇女被强奸，外国人的物业被抢掠和焚毁。

最后，一群美国和欧洲难民逃到美孚石油公司的驻地美孚山。

在此，他们又遭到攻击。

长江上的美英两国军舰于是赶来救援，舰炮齐射，形成一个半圆的火力保护圈，难民趁机从高大的城墙上顺绳而下，逃往江边，由登陆部队接应，用小汽艇送到军舰上。

那时，上游五十英里左右泊有两艘日本军舰，听到交火的声音后，火速赶来，迫不及待地要参与对中方的战斗，但抵达现场时，炮击已告结束。

两名日本舰长因为来迟而懊悔不迭，居然为此哭开了。

这是名副其实的大新闻，因此，我自然要浓墨重彩处理这个故事，遂在北京《英文导报》头版使用了八栏的大标题，导语则用了双栏粗体字。

第二天，好戏上场了。

我被召到克拉克的私人办公室，见里面赫然坐着北京《英文导报》的三位董事：教会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、基督教青年会书记德怀特·爱德华兹及半教会性质的北京语言学院校长W.B.彼得斯博士。

三个人由司徒雷登博士为发言人，所以他先开腔道：“我们来的目的，是抗议你把《英文导报》搞成一份不可饶恕的耸人听闻的报纸。

你把南京事件的新闻放在了头版，还用了危言耸听的大标题，你难辞其咎。

如果这件事非报道不可，那也应该把它放在内页里，只用单栏的标题就够了。

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一时不知该如何反应。

他们又把抗议内容重复一遍后，我才耐心同三人理论，就好比试着与童子说理。

我告诉他们，这条新闻是头等重要的。

自二十六年前义和团叛乱以来，这是美国军舰第一次向中国人开火，对此事的报道，当然要占据头版位置。

我指出，美国及欧洲的所有报纸，肯定会把轰炸南京的新闻置于当天最显著的位置。

他们的依据则是，本次事件必将损害中国人对美欧人士的亲善之情，从而损害他们各自的事业，因为

<<温故之十>>

他们都在中国传教、办学校、办医院。

因此，这类新闻必须封杀，或小而化之。

最后，双方搞得剑拔弩张，于是我拿出与克拉克的书面协议，上面言之凿凿，授权我全面掌控办报方针及新闻版面。

我对访客们直言，如果不收回抗议，二十四小时一过，我就拂袖而去。

而如果他们再敢以董事身份正式抗议，那我就当场辞职。

事后，我与这三位先生便再未谋面。

直到来年开春，我才因为一件急事，又找了他们三人一次。

由于此事可能危及报纸的生存及克拉克的清白，所以必须找他们面商。

<<温故之十>>

编辑推荐

《温故》（之10）看点：名家说：沈昌文（著名出版人）我们现在学习外国，还是要回头看看，而不能一味地往前看。

现在来温故，会有特别的意义。

雷颐（学者）如果对历史失去了记忆，对很多事情就会有不同的看法。

秦风（图片收藏家）无论如何，历史有一种呈现自我的自然力量，它不会完全被遗忘。

谢泳（学者）：《温故》要把那些过去说错了的事情，或者说是主流话语过去比较强烈地想让人接受的那些东西，尽可能给予校正。

<<温故之十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